

前言

徐鑄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報人、名記者和新聞學家。他是江蘇宜興人，生於一九〇七年，畢業於江蘇省立無錫第三師範學校和北京師範大學。鑄成先生在學生時代就為國聞通信社寫稿，畢業後加入《大公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十月間，他先後在《大公報》天津版和上海版任抄寫員、編輯和記者，期間還擔任過國聞通信社北京分社和《大公報》漢口辦事處的負責人。一九三九年七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先後任《大公報》香港版編輯主任、桂林版總編輯，重慶版《大公晚報》主編、上海版總編輯等職。他在《大公報》工作了十八年，深受胡政之先生和張季鸞先生的影響，從抄寫員成長為分版總編輯，是新記《大公報》的重要骨幹之一。這一時期是他報人生涯的重要歷程。

一九三八年二月，鑄成先生加盟《文匯報》，成為《文匯報》言論的總負責人。他在《文匯報》擔任總主筆、總編輯、社長等職務有五個時期，一是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上海《文匯報》，二是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上海《文匯報》，三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的香港《文匯報》，四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到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七月的上海《文匯報》。五次任職，五次中止，五個斷續的短暫時期，使鑄成先生走上了報人生



涯的巔峰。

有人說，徐鑄成的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件是辦《大公報》和《文匯報》，一件是當右派¹。其實，鑄成先生還做了第三件事，那就是在晚年他老驥伏櫪，筆耕不輟，寫下了大量的舊聞掌故、新聞研究、人物傳記和回憶文章，洋洋三百餘萬言，這不能不說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的這些文字都和辦報有關，他當右派也是因為辦報，因此，也可以說，鑄成先生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辦報；也只有一個理想：辦報，辦一份民間報紙，辦一份具有獨立立場的民間報紙。

一九八三年十月，徐鑄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在被迫擱筆的二十年中，實際上一直沒有擱筆，無窮無盡的‘檢查’、‘交代’，固然是老一套，不費腦筋，而一有空就讀書、思考，寫讀書筆記。一九七三年從幹校‘解放’，在辭書出版社控制使用，每天讀古書、寫卡片，即使退居灶披間，也寫到深夜。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不久，就寫‘回憶日記’。上半截記每天所聞的山河重整，天日重光的大事，下半截則從頭回憶我的‘前半生’的詳細經歷。每天寫，每天細細回憶。到一九七八年初，已寫了約二十萬字。這就為以後的寫作打下了基礎”²。徐鑄成先生的這部日記以每日回憶的形式系統記述了自己從年幼開始讀報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主持香港《文匯報》的經歷。

一九四三年初，當時在重慶《大公報》任職的徐鑄成先生前去拜訪陳布雷先生。“布雷先生並力勸我加入國民黨，他自己願破例當介紹人。我婉謝其意，並說參加一政治組織，等於女人決定選擇對象，此為終身大事。我對政治素不感興趣，願抱獨身主

1 徐復侖：《徐鑄成回憶錄》後記，見《徐鑄成回憶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424頁。

2 徐鑄成：《我不知老之將至》，見《風雨故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140頁。

義。布雷先生莞爾而笑，不以為忤”。¹ 這一“獨身主義”伴隨了鑄成先生的終身，也造就了他一生的悲喜劇。今天，我們將徐鑄成先生的這部日記整理出版，也正是為了使這樣一種精神能存於青史。

整理者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1 徐鑄成：《徐鑄成回憶錄》，114頁；本書205頁亦有敘述。

從十天以前，連下四五天漫天大雪，繼以嚴寒，直到今天才有些回暖。

這次大雪，在我記憶中，上海是少見的。前幾天最低溫度降到零下十度，在上海也可能是破紀錄的。

近來，常在夢中從事編報工作，醒後常覺茫然。“日有所思，夜有所夢”，二十年來，我對於新聞工作，早像玩火燙過了手的孩子一樣，離之惟恐不遠，還有什麼“所思”呢？大概，不僅因為從青年時代、中年時代從事於此達三十年之久，而且，從少年時代起，就對此發生過興趣，長年累月，在大腦皮層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記。所以，迄今還在夢中浮現罷。

我從什麼時候開始看報的呢？算來，距今已五十六七年了。一九二〇年發生了北洋軍閥的直皖戰爭，吳佩孚在這次戰爭中成了神話般的“名將”。在親戚的談話中，談到他如何以洋鐵桶裏放鞭炮，嚇退皖軍，從而打了勝仗的“奇跡”。我當時是十三歲的孩子，已聽過了許多《三國》、《水滸》的故事，覺得這位吳將軍真像小說裏的英雄一樣，因此，就想自己看看報，進一步詳細了解這些現實的“英雄”故事。

宜興縣城很小，直徑只有一華里，居民大約不過一萬，識字而又關心時事的不多，在我的親戚中，就沒有訂閱報紙的。“公共閱報處”只有一處，那是在城隍廟附近的育嬰堂裏。有一天，我嘗試著進去了，那是一個三間的大殿，中間供著送子觀音，神龕前掛了不少求子、“還願”的紅布條。左面一間，就是“育嬰”的地方，有一兩個嫗嫗在撫育被棄的嬰兒。我那時當然還不懂，為什麼有人那末渴望生兒子，而同時又有人甘心把親生的子女遺



棄到“育嬰堂”來。

右邊那一間，就是“公共閱報處”，一張長桌子，兩面放著幾條長板凳，桌上放著兩份報——上海的《申報》和《新聞報》。

記得我那天進去，只看見一個老頭（當然比我現在的年齡還小得多），正戴著老花眼鏡聚精會神地看著。我坐在他對面，翻翻這張，看看那張，才知道一天一份報紙有四五張，第一張有大字的“本報專電”，有“外電”，還有通信，後面是副刊。在“專電”、“外電”裏，果然找著了吳佩孚、段祺瑞等的名字，從而也看到了直皖戰爭後兩軍的進退和北京政局的變化。這樣，就慢慢地看出興趣來了。

城隍廟是我前往我所進的敦本小學的必經之路。從此以後，我回家吃過午飯後，提早若干時間上學，中途進入“育嬰堂”去看看報。先是只看“專電”、“外電”，後來，也看看“本埠新聞”乃至大字刊載的戲劇廣告了。

2月4日 十二月十七

星期五

晴

今天最低溫度還在零下四度左右，而陽光很好，積雪在融化。

昨天社裏（人民出版社¹）開全體會，大概是張潔等作交代。

1 人民出版社，指上海人民出版社。此時作者在上海市出版局《辭海》編輯部工作。當時實行“局社合一”制度，上海市出版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同一機構。以下注釋均為編者所加，餘不贅述。



我沒有去。今天上午，照例補足半休，因此，整天休假。

早飯後，去理了髮。據理髮員說，再過一两天，下鄉知識青年回來，就要開始緊張，以後越近春節就越忙了。

繼續回憶我看報的歷史。我開始認真看報，是在一九二二年進了中學（無錫的省立第三師範）以後。

那時的中學生活相當緊張，上下午各上課三小時，晚上還有兩小時在“自修室”複習功課。在下午上課前和下午四時至晚飯前，可以自由活動，一般在圖書館看書或在閱覽室看報。在晚上兩節自修課時間中間，也有十五分鐘休息，可以到閱覽室看報。

學校訂了五份上海報，即《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和《民國日報》。另外，還有兩份當地出版的報紙——《錫報》和《新無錫報》。

白天，這幾份上海報是放在教員休息室裏，專供教員閱覽，要到晚上，才轉到學生閱覽室裏來。

我不大看無錫報，它的國內外新聞多半是抄錄隔天的上海報，而無錫當地的新聞，我也不大感興趣。至於副刊，更不值得一看。

為了搶看當天的上海報，每當第一節自修下課鈴一響，我立即奔到閱覽室，抓起所要看的報紙，如飢似渴地看著。有些長篇的通信，或副刊好的作品，記下了題目，第二天休息時再去看。等到我升到高班的時候，也敢於在午後上海報剛送來的時候，闖進教員休息室去，和老師們並坐著讀報。這在當時戒規森嚴的第三師範，本是犯規的事，但老師們似乎也諒解了。

對於報紙的內容，我涉獵的範圍逐步擴大。除了“專電”、“要聞”外，當時最令我感興趣的是北京特約通信，每篇都署了名，我特別愛讀《申報》飄萍寫的和《時報》彬彬寫的特約通信，不僅文字好，對北京政局的變化，來龍去脈，乃至內幕背景，寫

得比較清楚。對於各報的副頁，也和其他同學一樣，喜歡《時事新報》的“學燈”，和《民國日報》的“覺悟”。儘管無錫第三師範的復古空氣之濃是有名的，但“五四”以後的那股新潮流，早已洶湧在我們這一輩青年的腦海裏了。

另外，《申報》的副刊“自由談”和《新聞報》副刊“快活林”，分別由“鴛鴦蝴蝶派”大將周瘦鵑和嚴獨鶴主編，那也和《申報》署名“冷”、“默”等不痛不癢、不知所云的“小評”一樣，偶然看看，嗤之以鼻而已。

那位在《時報》寫通信的彬彬，後來才知道是我們小同鄉徐凌霄。事有湊巧，若干年後，我和他還在《大公報》同過事，他不僅和他的弟弟一士在《國聞周報》連續寫《凌霄一士隨筆》，專談掌故，是很受一些讀者歡迎的。他還為《大公報》編過一個時期的副刊“小公園”，我那時編教育版，但他在北京工作，他所選定的稿子，每天由我兼做編輯和修飾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我從香港到剛解放的北京，還和一士見過面，聽說凌霄已作古幾年了。他們兩兄弟是戊戌政變時因推薦康梁而被關進牢監多年的徐致靖的姪子，是我的同鄉前輩，也是新聞界可敬的先輩。

飄萍，即邵飄萍，是現代中國新聞界的初期闖將。我到北京讀書時，他已在那年上半年被直魯軍閥張宗昌殺害了。他的《京報》還出版，由他的夫人湯修慧主持。承她的青睞，我曾有過一個時期為該報兼寫太原通信和天津通信，也算間接和飄萍結了緣。這都是後話，是在無錫當窮學生時做夢也不會想到的。

2月5日 十二月十八

星期六

多雲

上午上班，組長傳達運動情況。前兩天大會，張潔、沈鴻壽分別作了揭發交代，群眾聽了很不滿意。領取工資。

下午二時，在文化廣場看“內部”批判電影《反擊》。電車極擠，而且極不正常，往往一路車一下來了六七輛，時而又久久不來。

今天立春後一日進入“六九”。人大概總是健忘的，我活了七十年了，但對於氣節變化，總還沒有規律知識。前幾天嚴寒，立了春，就以為春暖快到了，而忘了還要經過一段春寒季節。

前兩天回憶了最初看報的情景，那末，第一次在報上發表寫的東西在什麼時候呢？

那是在進了清華那一年，即一九二六年。我是師範還未畢業，借了高班同學徐錫華的文憑考進了清華的。三師的校長陳綸，想敲一筆竹槓，威脅我母親，要索二百元。當時，我家裏很窮，我聽了他的卑鄙手段，十分氣憤，寫信質問了他，他惱羞成怒，一再寫信清華當局，甚至威脅清華說，如不開除我，就要向教育部告發（其實，當時借文憑考學校是普遍現象，一般是馬虎過關算了的）。因此，我進了清華滿一學期就被迫離開了。

就在離開清華的前一個月中，天津《庸報》創刊，大概是為了做廣告罷，在報上發表了徵文啟事。徵文的“條件”很刁鑽古怪：一是長篇小說，最少五千字，故事的時間限於一天之內；二是短篇小說，最多不超過五百字，故事的時間拉得越長越好。我寫了一篇不到五百字的稿子去應徵。故事的模型取材於我家的一個疏房姪女，嫁到一家土地家裏，因為婆婆虐待，終日忙於洗衣燒飯餵豬等等，結果，不到二年就勞累而死了。這篇“小



說”，我取名為《笑的歷史》。想不到過了二十多天，該報登出徵文結果，我的“處女作”竟被列為第一名，獎金是十元。這是第一次我的名字印在報上，是第一次寫的東西被刊佈出來，也是第一次憑自己的腦力勞動獲得了報酬。我收到這筆稿費時，已離開清華，寄居在我舅舅家裏，報社特別派人把稿費送來，取去了收條。不是鈔票，而是白花花的十元“袁大頭”（當時如果買米，可以買二擔半）。我心中的甜滋滋，是可想而知的，雖然我因為被趕出了學校，前途茫茫，愁苦終日，而這一“收穫”，至少在苦果上加了一小勺糖，從而也增加了我在人海茫茫中奮鬥掙扎的勇氣。

2月6日 十二月十九

星期日

陰

又有新的冷空氣南下，今天最低溫度又降到零下五度左右。今冬的溫度不僅特別冷，而且冷的時間特長。報上說，北美、歐洲今年也特別冷。

我和新聞事業開始非正式地發生關係，是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我被清華辭退後，即到保定混了半年。我父親在保定車站當“司事”——一種近於司書的小職員，已幹了七八年，薪水每月只有三十多元，而且常常欠薪，七折八扣。他老人家既要養活遠在宜興家中我的母親和妹妹，自己也要必需的零花，要供給我在大學，是萬分吃力的了。我在保定河北大學半飢半飽地過了半



年，夏天又以同一的假文憑考進了北京師範大學，為的是不收學費。

學費雖然不收，住宿吃飯還是要錢。我和一位小學時就同學的好友朱景遠一起借住在香爐營的一家公寓裏，條件是每人房租伙食費九元。這是很重的負擔，對我們這些窮學生來說。

我經常不向父親要錢，生活是靠這個好友的支持，而他也是靠叔叔接濟的，一個人的錢兩個人分著用，當然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千方百計，我想找一個職業。

正在這時，看到上海報上刊載一個廣告，是“日日通信社”徵聘北京通信記者。從廣告看，這個社的規模不小，總社在杭州，上海和南京、漢口都有分社。我便應徵，連寄了三篇通信，不久接到回信，說對我很滿意，並寄來了聘書，每月酬金暫定三十元，將來再看成績遞加。我當時的高興是可想而知的，不僅我不必向父親要錢了，我的好友也不必向他叔叔伸手了。

從此，我努力地寫，總是白天在學校留心看各種日報和晚報（我當然還不可能也無門路去直接採訪），晚上綜合一些見聞，撰寫通信常至深夜。第二天清早，為了趕上當天南開的火車，必須清早送到正陽門郵局，從香爐營到前門，總是步行來回，再趕到學校上課。有時，是我這位好友代我去送。

記得第一篇通信是寫的東陵盜陵案始末，即直魯軍閥孫殿英炸開慈禧太后的陵墓盜取大量古物財寶的經過。這篇通信，《申報》等各大報都登出了，以後陸續寄出的，大都也散見各報，但一個月過去了，二個月、三個月過去了，不見分文寄來。窮學生多受點累，多跑跑路倒無所謂，紙張郵費卻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後來，只得停止寄稿了。停稿不到一個月，忽然接到該社上海分社寄來一封信，附來了二十元。信上說，總社經濟困難，今後，稿子請直接寄分社，每月準暫付酬勞二十元。這樣，我又繼續寫了一個時期，後來，這個分社再也沒寄錢，我的義務勞動，也就

糊裏糊塗結束了。

若干年後，我才知道這個日日通信社，是一個杭州人殷再為創辦的，完全是買空賣空，此人後來辦了報，終於在“七七”抗戰後成了附逆報人。

2月7日 十二月二十

星期一

陰

上午上班後，聽傳達中央今年一、二號文件，是關於“工業學大慶”和實現農業機械化問題的。

我和《大公報》、國聞通信社和《國聞周報》這三個姐妹機構，最初發生關係的是《國聞周報》，大約在一九二七年底，正是我們經濟十分困難、千方百計想搞點錢來維持生活的時候。有一天，大概在青雲閣舊書店裏看到一大堆西文舊書在大拍賣，每本只一二毛錢，我們檢了半天，看到一本意大利作家鄧南遮的小說，篇幅不大，標價兩毛，就買下來了。鄧南遮這個名字，在《東方雜誌》等刊物中是看到過的。因此，我和我的好友就分頭嘗試了翻譯。大約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努力，終於翻出來了。就署了我的名字（其實，我的朋友英文程度比我好，他譯得比我多），寄給了《國聞周報》。本來是姑妄投之的，沒想到不久就



登了出來，彷彿記得還分登了兩期¹。總之是寄來了二十元稿費，因而大大緩和了我們和公寓老闆之間的矛盾。這位老闆的討債本領是很高明的，如果到月的房飯費沒有給他，他必然在你忙於功課的晚上，忽然跑進房來，坐在矮凳上，“和顏悅色”地說：“徐先生，我是實在沒法可想了，您借幾塊錢給我應應急吧。”非等你說出付錢的確切日期，（不然）他會把“苦經”無盡無休的嘆下去。

就在這一年（一九二七年）年底，我生平第一次跨進了職業的門檻，也就是進入了我以後先後工作了十八年的《大公報》的大門。

上面提起過，我有一個極其潦倒的舅父，住在破雜院裏，他在華洋義賑會工作，後來不知什麼機緣，在國聞通信社兼任編輯，兩處的薪水大約合起來有七八十元，但因為他抽鴉片，真可說是家徒四壁，天天打著饑荒。

有一天，他寫信給我，說國聞通信社要添招一個抄寫鋼板的人，每天晚上工作二三小時，如果我願應徵，他可以介紹。

過一天，我隨他到了蘇州胡同附近船板胡同的國聞社，講明了每天下午四時到六時為工作時間，薪水是二十元，另外，還免費供給一頓晚餐。從此以後，我算找到了半工半讀的機會，能不能度過經濟難關的焦慮算是暫時解決了。

工作是簡單的，練習了幾天，寫的蠟紙便比較清楚了，也不影響學習，下午三時後，學校向例沒有課了。特別滿意的是工作後的一頓晚餐，四碗一湯，冬天還是火鍋，白米飯、花捲，自從離開清華後，久久未有這樣的享受了。

1 這篇小說名為《賴婚》，美國 Bornha M. Clay 著、徐鑄成譯，分兩次連載，先後刊於 1928 年 1 月 8 日上海《國聞周報》第五卷第二期和 1928 年 1 月 15 日上海《國聞周報》第五卷第三期。